

略论沈从文的初期创作

邵华强

沈从文的初期创作，指的是沈从文第一本创作集《鸭子》出版前的早期创作的最初阶段。这时期作品体裁多样，有小说、诗歌、散文，还有一定数量的戏剧，并且大部分没有收集，国内外研究者的论述也大都未谈及这些作品。研究这一时期的创作，对于探究沈从文整个文学创作道路，正确评价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本文就此略抒管见，希望得到批评指教。

沈从文创作初期的作品，在内容上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作者以其疾愤的笔调，揭露、鞭鞑了贪婪、虚伪、正在“腐烂的”、醉生梦死的官僚阶级和上流衣冠社会，如《三贝先生家训》、《船上》、《松子君》、《宋代表》等等。在《三贝先生家训》里，作者刻划了一个吝啬、虚伪、刻薄的湘西地方绅士形象，他贪婪成性，去市场上买肉，对小商贩采用既要“择皮薄骨少心欲所得”部分，又要占“斤两上便宜”的手法；招待客人时则吩咐佣人“冲茶之水不必顶沸”；甚至出售厨房中的粪水给农民，也要多拌“草木灰以重斤两”。就这么个丑类，却被他的同流，县知事、稽查局长、警察局长、当地的名流绅士们誉为“年高有德”。《船上》里面的土匪气十足、连字都不识的团长，就因为靠着镇压“乡巴佬”有功，官阶一再升迁，地方绅士也竭力恭维他；他所能干的事，除了“清乡”，就是“捧烟枪”，乱“搅女人”、“吃空饷”；他的部属军官，也只会欺侮“乡巴老”，为官长造假名册，送烟枪，做“牵头”，寻花问柳。在沈从文的笔下，中国农村的绅士官僚阶级及他们的支柱封建军阀，一个个都是没正常人性的人，均属人类中的禽兽之流。

当时已在北平生活的沈从文，他揭露的笔触，并不只限于乡村豪绅、官僚和封建军阀，而是如他自己所说的，要为所有的高等人造出一面面能“照出自己真实面貌的镜子”（《绅士的太太》）。他初期的一些作品，确是一面面照出大都市“文明人”肮脏灵魂的镜子。在他的笔下，有满口治国宏论，实质男盗女娼，专门“左手放在眼边擦那为受委屈而流的泪，右手又反过去从背后接那遮盖钱”的所谓“学者”（《我恨他的是》）；有终日无所事事，闲得无聊，爱窥探信奉“新思潮”的男女关系真谛的盲绅士（《盲人》）；有堕落颓废，专门描写官僚与侍妾淫乱以赚取稿费的黄色作家（《松子君》）；有专横跋扈，欺凌弱者，阿谀上司的高级职员（《棉鞋》）；有势利、鄙俗、趋炎附势、喜欢耳食几个新名词以饱刺激欲的小姐、少爷，号称杰出的“新文学作家”，实质怯懦、猥琐的密司脱洪之流（《一个晚会》）；有混迹于学生运动，集会上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抵制洋货”，背后却大吸“三炮台”，表面

上慷慨陈词要“为正义流血”，灵魂里却只想升官发财，“多讨几个小鸽（小老婆）”的阴谋家（《宋代表》）；有“诸事亨通”“奶桶充满”“骨髓滋润”“小孩子出去多如羊群”的官僚总长（《旧约集句》）。一个个为“无伤大雅的虚荣所驱使”，千方百计想站到现代“文化水平”上（《晨·引言》）来钻营谋利的寄生虫和昏庸的官僚，在沈从文初期如万花筒镜子般的作品里受到了淋漓尽致的暴露。

强者统治的腐烂世界，是建筑在弱者的贫穷和饥饿之上的。有对强者世界的谴责、鞭鞑，必然有对弱者的同情、关注。以现实的“捕捉那些在我眼前闪过的逝去的一切”（《第二个拂拂引》）为基本创作方法的沈从文，用他饱蘸着同情和关注的笔调，在揭露和鞭鞑的同时也描述了社会下层人民的苦难和不幸。这是他初期作品的第二类内容。

在这类作品中，作者忠实地描绘了社会下层人民生活的真实画面。他们生活极端穷困，人格惨遭践踏，丝毫享受不到人间的温暖和幸福。《我恨他的是》中“无抵抗”的女人，惨遭蹂躏后不但得不到强者的“可怜”，反而连自己唯一生存的根基“饭碗、筷子、营业执照”也被强者蛮横地夺走。《初八那日》里那个年近半百连媳妇都还没娶上的穷“七老”，为了糊口终年的劳累，最后竟惨死在刚过去不久的隆重、豪华的富翁家的迎亲队后面，最后陪伴他的只有一只大公狗，它却在“舔嗅着从七老口中挤出的豆腐汁（脑浆）”；但在生活的那一边，富翁们正摆着喜庆的筵席，穷奢极欲，花天酒地。这真是一幅残酷的“朱门喜迎亲，路有穷汉血”的现实生活画啊！

即便是有时做做“未来美丽的梦”的小知识分子阶层，他们也是朝不保夕、穷极潦倒，时时在生命线上苦苦挣扎。沈从文的部分自叙色彩相当浓厚的作品和文章，如实地记载了当时小知识分子凄惨的生活境况。现查到的沈从文第一篇发表的文章《一封未曾付邮的信》中的主人公“我”，催债的公寓掌柜，几乎要踏平他的门槛，他那可怜的“愿意用我手与脑终日劳作来换每日低限度的生活费”的生活理想，还是屡屡碰壁。“我”忧愤的感到：在这“茫茫的人海中”，向何处“去寻同情和爱”呢？残酷的现实使他认识到“在这个做抗争逐世界里，别人并不须对他一人负有甚么应当必然的义务”。“要把我扼死了”的生活之绳，“我是无法解除的”。无业的青年是如此，有业的青年也并不见好。《棉鞋》中当小职员的主人公，微薄的收入仅能维持起码的糊口所需，三九严寒时节还买不起棉鞋，靠着一个农科大学学生行慷慨，典当了秋季夹洋服替他买了一双棉鞋。自此，棉鞋就永远陪伴着他。渡过了严冬，混过了酷暑，棉鞋成了才才于于、破了又破、补了又补的“拖鞋”。那帮文明儒雅先生，见此则大大地厌恶，去图书馆借书，管事的眼睛“一下就盯在脚上”；遇到逛公园的阔老，见了他的穷酸样，把他估计得“比脚下一双鞋都不如”；那个当教育股长的上司，竟用“打狗棒（文明棍）”来当面侮辱他。但和鞋子“同命的我”有什么办法呢？那农科大学生的洋服还没见赎出来。

年青的沈从文对造成这种不公道现实的原因看得很清楚的，在《公寓中》说：“胜利永远属于强者”，“这世界只要我能打倒你，我便可以坐在你身上，我便能操纵你的命运，我可以吃掉你”。所以他认为“爱！同情！公理一类名词，不过是我们拿来说起好听一点罢了！谁曾见过事实上的被凌辱者，能因‘同情’与‘爱’一类话得到一些救助。”

但沈从文并不是一个生活中的绝望者和颓废者，他曾享受过人间的温暖，他也有他的社会理想。这种曾感受过的温暖和生活理想，蕴藏在他梦一般的对湘西农村生活的回忆和缅怀里。这是他初期作品第三方面的内容。在第三类作品中，作者热情地描绘了湘西农村宁静、

安逸的境界，讴歌了普通劳动者善良、朴实的美德和他们淳朴的生活。

作者在《夜渔》中描绘农村丰收后的晚景时写道：

天空的月还很小，敌不过它身前后左右的大星星光明。田间两旁已割尽了禾苗的稻田里，还留着短短的白色根株。田中打禾后剩下的稻草，堆成大垛垛，如一间间小屋。身前左右一片繁密而细碎的虫声，如一队音乐师奏着壮严凄清的秋夜之曲。金铃子的“叮……”，象小铜钲般清越，尤其使人沈醉。经行处，间或还闻到路旁阔小生物的窸窣。

这是一个多么宁静宜人的境界呵，真如同到了陶渊明理想王国桃花源一般。创造这个境界的人，是淳朴的、善良的，生活在这王国的人，是幸福的，人间的残酷和不幸是不会降落到他们身上的。《往事》中的芸儿，在当农民的勤劳的四叔、五叔和父母慈爱的关怀下，天天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尽情地享受着人间应有的童年欢乐；《玫瑰与九妹》中描写的普通贫民家孩子的亲切戏谑和互助；《夜渔》中描叙的农家在丰收后其乐融融的场面，……所有这一切，同那卑鄙、肮脏、贪婪、虚伪、淫乱的统治阶级和上流“衣冠社会的禽兽世界”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回忆的梦，体现着年青的沈从文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成为贯穿沈从文初期创作的一条鲜明的脉络。

但是，梦毕竟是梦，时时处于贫困和饥饿威胁下的沈从文并没有把它作自欺欺人，逃避现实的逍遥宫，他在这里仅是抒发着向往自由、幸福、淳朴的生活理想。对于现实和“梦”的关系则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神给予的梦，是不能解除这丑恶人世“悲伤忧郁不平”的“冤苦”的（《绝食以后》）。他并不相信那些虚伪的“哄骗”（《失路的小羔羊》）。他这一思想，在第三类作品中也隐约可见，和睦融融的八儿一家，也时时有饥饿的威胁（《代狗》）；美丽、生动的乡村“市集画”里，也有“讨人烦腻的副爷们，与穿高统牛皮靴子的团总”的影子（《市集》）。

对官僚阶级和上流衣冠社会的揭露、鞭挞；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和受侮辱、遭欺凌的弱者的深切同情和关注；对湘西农村朴实、安乐、幸福生活的回忆和向往，这三方面内容构成了沈从文初期创作的现实主义基本倾向。作家创作的源泉来自生活，他初期作品的思想内容和现实主义倾向是由沈从文独特的早年生活道路所决定的。

1922年冬天，沈从文出生于湖南湘西一个不富裕的军人家庭。从他三十年代撰写的《从文自传》里，我们可以看到他有一个安宁、幸福、自由的童年。十三岁那年，按当地的惯例，他当了兵，在旧军队里断断续续地渡过了近七年“……不易设想的痛苦怕人生活，也因之认识了些旧中国一小角隅好坏人事”（《沈从文选集·题记》）。1922年春，他受了刚波及到湘西这个穷乡僻壤的五四运动余波的影响，离开家乡想入北京的国立大学读书。不久，接济他资金的同乡因自家地位动摇无法继续在经济上供给他。他不但入学不成，而且生活发生了严重的困难。他想投靠当时在北京号称大慈善家的亲戚熊西龄，可势利、虚伪、冷酷的绅士豪门是不容许一个穷极潦倒的青年跨入的。后来他多次为生活着落的努力也均在大都市“文明人”的鄙视和讥笑下碰了壁。在几个同乡（在京的穷大学生）帮助下，他只得在饥一顿、饱一顿，冬无御寒衣，夏无象样单衫的贫困中打发日子，身边唯一的财产是一部《史记》和一部破旧的《圣经》。到1922年底，在正直、善良的作家郁达夫、徐志摩、刘勉己等人的帮助下，他开始学习创作，并用休芸芸的笔名开始在北京的一些报刊上发表文章。这时，童年宁静生活的回忆，土著军阀部队给他心灵上留下的阴影，绅士官僚阶级的冷酷、贪婪、虚伪使他产生的憎

恶，在生活无着，穷困潦倒的境遇中形成的对社会底层人民苦难的同情……，这一切自然而然地汇成了他创作感情的激流，决定了初期作品中爱憎分明的基本倾向。

沈从文初期作品在艺术上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特点。

首先，他初期作品的取材如此之广，是新文学史上多产作家中少见的。他的笔下有农民、士兵、工人、穷学生、潦倒的小职员、天真顽皮的孩童、军官、绅士、洋学生、刽子手、赌徒、屠户、把总、地痞流氓甚至神话般的狐狸、兔子等等形象；他初期作品反映的社会背景，有淳朴的农村生活，有大都市畸形的“文明社会”，有重要的社会政治事件，也有被侮辱被损害者的“一小角隅”。这种创作上的特点，是我们应注意的。

第二，沈从文初期作品有着浓郁的湘西地方色彩。如《市集》、《三贝先生家训》、《玫瑰与九妹》、《夜渔》、《槐化镇》、《Lao mei yuo hen!》（苗语：妹子，真美啊！）《赌徒》等等。人物性格特征都带有明显的湘西地方习性，人物的对话语言杂揉着湘西方言土话，作品描绘的生活场面，当时徐志摩认为是美丽、动人的“一小幅湘西乡村画”（《志摩的欣赏》）。这也是二十年代作家群中不多见的艺术创作特点。

第三，他初期创作的小说，篇幅短小，最长的如《占领》（原名《占领渭城》）仅五千余字；故事情节上“不拘常格”，有平铺直叙，也有出人意料之外的结尾，如《船上》、《宋代表》等。这也是在现代作家的创作上少有的。

第四，在语言上除大量的运用湘西土语、方言外，还有“的”字用的相当少的特点。如《宋代表》里对主人公住处墙上对联字体的描写：

“字学什么模花道人体，用笔极其有劲，笔画蜷屈盘旋，磅礴郁劲，款署痴君二字。看样子，大致也是出于名手。”

这里没有一个“的”字，句法相当简洁活泼，富有表现力。沈从文作品这一语言上的特点倒是当时欧化味颇重的新文学作家中独一无二。

总之，在创作初期，沈从文虽然还谈不上已形成自己成熟的、独特的艺术风格，但已有了明显的与众不同的艺术创作特点。这些特点，不能不看作是一个杰出艺术家在他创作初期（或曰学习创作期）中萌发的独特艺术风格的“兆头”。

当然，作为一个处于学习期、成长期中的作家，他的作品也有明显的不足。在思想内容上，对上层官僚和绅士阶级本质的揭露还欠深刻。作者较多的是从人性与道德角度来展示、暴露这些人的灵魂，没有（事实上也不可能）在结合人们社会经济关系来揭露这些人的阶级属性；对于社会底层人民，作者倾注了自己炽热的感情，但碍于当时的思想认识水平，在揭示“苦难的根源”上做得还不够。艺术上总的来说精雕细刻的还不多，有些作品结构也不够严谨，有些作品因急于排稿付印以对付生活所需，在语言上也欠通顺。自然，所有这些不足和沈从文当时的思想水平、艺术修养水平和实际生活处境是分不开的，是一个从独特的生活道路走过来的作家在成长期中不可避免的。在那时，他确是他属于“未熟的天才”。

综观沈从文初期创作，我们还应注意以下几点：

沈从文并非是个专“玩弄文字”的“魔术师”般的作家。解放前后的学术界一直有个误解，认为沈从文是“一个新文学界的魔术师，他能从一个空盘里倒出数不清的苹果鸡蛋”，而这种“苹果鸡蛋”式的作品多系“空虚浮泛”，无多社会意义。（见苏雪林《沈从文论》，田仲济、孙昌煦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我们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他相当部分作品，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展示了有一定广度的当时中国社会生活的画面，揭示了某些社会本质问题。所

从“反差不多”看沈从文的文艺观

飞舟

解放前蜚声文坛而解放后几乎消声匿迹的老作家沈从文的作品，以亲切、真挚、热情的笔触，通过对日常生活和人物心灵深处的微妙活动的细致刻划，描绘一幅幅色彩鲜明，诗意浓郁的生活图画。因此有不少人读了他的小说、散文后常常情不自禁地倍加赞赏。然而，人们在惦念沈从文的创作时，却往往忽视他在文艺创作理论上也有独到的见解。现就读了沈从文化名“炯之”写的一系列反文艺创作中的“差不多”现象的文章，看看他的文艺创作思想。

沈从文首先在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大公报》第237期《文艺》专页上以炯之的名

字发表《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第一次提出了“反差不多”运动。“书人月刊”“月报”等杂志随即将此文转载。文章的内容大意，他自己归纳为：“近年来中国新文学作品，似乎由于风气的控制，常在一个公式中进行，容易差不多。文章差不多不是好现象。我们爱说思想，似乎就得思得想。真思过想过，写出来的文学作品，不会差不多。由于自己不肯思想，不愿思想，只是天真糊涂去拥护所谓某种固定思想，或追随风气，结果于是差不多。要从一堆内容外形都差不多的作品达到成功，恐怕达不到。”^①面对当时文艺界的状况，沈先生勇于求实，讲究



谓“魔术师”、“空虚浮泛”的观点在史实面前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我们反对牵强附会，任意拔高的市侩作风，但也不能同意人云亦云，不做深入细致地分析研究即轻率定论的做法。

其次，沈从文是以“风格作家”的身份出现在新文学史上的。风格即是思想特征和艺术特征的统一体。分析他尚未达到“成熟”和“独特”阶段的作品，也不能不从他独特的生活道路中形成的人生观和艺术观的综合考察入手。我们全面评价沈从文的作品和整个文学道路时，更不应该片面的只看沈从文的艺术技巧而忽略作者在作品中浸透着的独特感情了。

再次，一个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主要应看其作品成就的大小。沈从文在其创作初期，即为新文学事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这种贡献，我们理应给予一个正确的评价。文学批评史上那种连作品“一本都没看过”，只凭片面的感情就轻率地贴上“桃色作家”标签（见郭沫若《斥反动文艺》）的做法，现在理应作为学术界的封建意识、官僚学阀作风铲除掉了。